



供水排水公司《长征组歌》演唱会掠影



弘扬长征精神 继续新的长征



Yuan quan

源泉

准印证号: JL01-0398 2016 年 10 月 25 日 第二十二期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供水排水公司 主办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总第 369 期

长征精神

不怕牺牲 前赴后继
勇往直前 坚韧不拔
众志成城 团结互助
百折不挠 克服困难

唱响长征组歌 坚定理想信念

公司举办《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10 月 15 日下午,公司与河北省直老干部合唱团在石家庄人民会堂共同举办了以“坚定信念跟党走”为主题的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长征组歌》大型演唱会。演唱会上半场,公司管乐团演奏了《难忘的旋律》之后,由省直老干部合唱团举行了建团 30 周年专场音乐会,演唱了该团多次参加全国合唱比赛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等 8 首获奖曲目。下半场,公司管乐团和石家庄交响管乐团共同演奏了《长

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公司合唱团与省直老干部合唱团组成的 135 人大型合唱团演唱了由《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10 首歌曲组成的《长征组歌》,公司管乐团、石家庄交响管乐团共同演奏了《长

征之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赢得了现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整个演唱会气势磅礴、震撼的演出效果、唯美的舞美设计给现场观众崇高的革命洗礼和充分的精神享受,受到与会领导和现场观众的高度赞誉。在此次演唱会中,合唱团、管乐团展现了公司的良好形象,充分体现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展现出职工良好的个人素养,有力地推动了公司企业文化建设。公司领导对这次《长征组歌》演唱活动极为重视。工会、党群工作部、综合办、宣传部等

相关部门精心筹划,周密安排,在去年演出《长征组歌》百人合唱的基础上增加了演唱人员。各部门、各单位主动配合,全力支持,确保了演唱会圆满成功。公司合唱团员以及乐团演奏员由各级管理人员及各岗位的职工组成,从 8 月 2 日开始,近百名职工利用下班和公休的时间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并请来专业老师进行指导。从高层管理人员到一线职工,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经过两个多月的严格训练、紧张排练以及与河北省直老干部合唱团的多次合

练,迅速达到了演出要求。合唱团员中有很多年龄大的同志,演出期间,参加演出的人员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始终目不斜视,纹丝不动。演唱时个个精神抖擞,群情激昂,使演唱会取得了圆满成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想当年,八万多红军将士以坚定的革命理想和崇高的信念,前赴后继,英勇作战,铁流两万五千里,在硝烟弥漫的战火中和充满艰险的征途上,

(下转第二版)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萧华与《长征组歌》

文/ 王 宁

他仍坚持每天读书、练字，并为部队写了几首歌词。9月，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从此，不到50岁的萧华，肩负起全军政治工作的重任。1964年10月，是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30周年。萧华是万里长征的参加者，又是幸存者。他深感自己有义务，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经过反复考虑、比较，他认为诗歌这种形式，可以用丰富的思想感情，凝练而有韵律的语言，集中、概括、形象地表现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于是，他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极大的创作热情，以抱病之躯，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倾情创作了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的《长征组诗》。

1964年5月，我从驻河北邢台某部2连被调到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组从事歌词创作，有机会荣幸地和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专业词曲作家一起工作、学习。1965年2月，战友文工团接到了萧华创作的《长征组诗》，立即组织精兵强将作曲。当时的谱曲创作及后来的排练、演出情况，有时我亲眼目睹，有时现场观摩、学习，创演人员以红军的长征精神，谱写和排练《长征组歌》，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65年4月中旬，由时任战友文工团总团副团长兼歌舞团长的晨耕，带领生茂、唐河、遇秋一行，到杭州向萧华同志汇报《长征组歌》的作曲初稿。汇报时，从第1曲到第10曲，4位作曲者边打拍子边唱，边穿插画明一些创意。遇到合唱段落，每人唱一个声部。晨耕唱男高音，生茂唱男低音，唐河唱女高音，遇秋唱女中音，前奏、间奏由唐河一人代表乐队，用声音模拟管弦鼓号的伴奏。萧华听着激动不已，随着作曲家的演唱，不由得也吟唱起来，眼里噙着泪花，有时还挥动拳头，踏着步子，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长征的行列。汇报进行得不错，萧华比较满意，为了表达谢意，他私人宴请4位作曲家吃了一顿丰盛特产“叫花鸡”。

回忆是一支唱不尽的歌。为了进一步加工、修改《长征组歌》，萧华同志不顾病痛，专门安排了几天时间为4位作曲家讲长征的故事和《长征组诗》的创作过程，他边忆边讲，昔日的炮火硝烟历历在目。他现身说法，深入浅出，逐字逐句地讲了《长征组诗》的创作思想、意图，以及对作曲的设想和要求，讲了长征途中与组诗相应的历史背景和动人事迹。讲到战斗激烈时，

外一股。战士的心智受到极大的考验。行军路上，担架队的战士梅若坚问萧锋：“总支书，这里是什么地方？二军团、六军团在哪里？走到哪里是个头？”

最后，红三军团的第十八团、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大部分指战人员没能到达江的对岸。最惨烈的红三十四师担任殿后任务，面对十倍于己的国军，最终全师七千多人仅剩九十多人。湘江战役后，整个中央红军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至3万多人。

“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

喋血湘江，迫使红军将那些沉重的设备一股脑扔进了江里。另一个聊以慰藉的结果是，存活下来的战士点燃了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情绪，直接促成了“黎平转兵”和遵义会议。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事实上掌握了红军的领导权。

但磨难并未结束。中央红军在转战云贵川三省时陆续动员了近万人参军，但缺乏锻炼的新兵大多数掉了队。尤其是涉险穿越川西北草地后，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只剩8000人，左路五、九军团约5000人。由于张国焘分裂红军，中央纵队和一方面军主力一、三军团单独北上，1935年10月进入陕北时只剩下6000人。

到达陕北时，陈赓曾回忆说：“我当大队长，骑着马在前面走，不敢回头看，因为一看就把整个大队看完了。”由于人员锐减，陈赓由师长改任由原三军团第十三团编成的第十三大队队长。

不过，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

经历了生死考验的红军将士，许多人被派到山西、陕甘等地发展地方武装，到1936年秋，红一方面军和地方红军的总数恢复到了三万余人。

1936年10月22日，经过两年零五天的漫长征途，红二、红一方面军成功会师。在黄土地上，红色政权重新建立。

作为第一个进入红区采访的西方记者，斯诺后来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里这样写道：“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们——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行军’，它不是战役，也不是胜利。”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如此评价长征：这是一次生死攸关、征途漫漫的撤退，即使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

“每一场革命都有它自身的传奇，”索尔兹伯里说，“本世纪中没有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地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来源：《南方周末》）

专题

五、八、九军团8.6万人组成野战军，于10月中旬突围西征。

对于项与年送信一说，赣州市委党史办公室副主任凌步机并不赞同。

一来，他对莫雄作为国民党德安地区专员是否有资格参加9月下旬庐山召开的整军会议存疑。已公开的蒋介石档案记载，上官云相、杨虎城、徐源泉、孙连仲、张印湘、梁冠英等将领参会。

二来，“蒋介石8月27日电令东路、北路军于9月底到达石城、古龙岗与兴国一线。而李德通过无线电情报获悉敌军把发动新的进攻日期提前了一个月。”在凌步机看来，李德获悉的这份情报，更有可能是长征出发时间定在10月下旬的直接原因。

“长征的准备工作在至少在长征前半年就开始了。”李德的翻译伍修权认为。他的依据是，大规模扩红和拆卸、包装重型装备所花费的时间恰好约半年。可以佐证的是，1934年5月-9月，整个中央苏区动员了80473名新兵，筹集军粮901068担。一个号召农家妇女为红军编厚草鞋的宣传运动在苏区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一切准备开始的时间，正好是广昌战败之时。“三人团”的争吵

实际上，在广昌失利后，中共党内便展开了激烈的检讨和辩论。张闻天等人开始站到了博古的对立面，追究后者在过去所犯下的错误。最终博古丢掉了前线司令部政委的职务，军事执行的权杖重新落到周恩来的手中。

而中央苏区剩下的八万有生力量是走是留，走多少，留多少，成了头等大事。“三人团”里首次爆发了争吵。这个分歧在李德与周恩来之间。

李德的想法是，仅让第三军团冲出包围圈，抑或只在苏区内进行防御，从而保证主力返回。周恩来则认为，应该实行脱离整个苏区的“战略性转移”，包括所有行政机构、后方服务机构、军事设施以及大部分在苏区内部和边界地区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的独立地方武装力量。

博古充当了和事佬。按照李德回忆录里的说法，最后两方达成一些妥协，但周恩来占上风。“据我估计，转移的人数只是略微降低了10%至20%。”李德说。

反“围剿”节节败退，苏区眼看就要失守，高层领导中的不满情绪甚嚣尘上。种种迹象表明，“只是等待”的毛泽东不再是孤军奋战了。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杨滨章在其著作《从革命到政治：长征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写道：“1934年夏，由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所组成的中央反对派‘三人帮’已经开始形成，同博古、周恩来和李德所组成的中央掌权派‘三人团’的对抗越来越明显。”

长征初期，月初初愈的毛泽东不时从抬他的担架上下来，和张闻天以及关键的“布尔什维克”王稼祥聊天。他们

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石中球回忆。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和他等几个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一起开会，劳动部长在新陂区已经扩红一个月，却一个新兵都没有动员到。听到这个情况，毛泽东的一句话让石中球印象颇深：“扩、扩、扩，天天都是阿弥陀佛”。就好像他已经预感到，撤离，势在必行。而扩红，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至今，石中球仍然感佩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那次会后，石中球接过劳动部长未完成

的扩红任务，结果下去发现，群众竟然都躲起来了。

其实，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早在第四次围剿之初就撰文写过这样的现象：“很多边区的群众上山之后又下山，度过一段平静日子后，又陷入恐慌。现在难以召集他们开会和采取军事行动。敌军一天天逼近，群众、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干部都对主动出击失去信心。”

然而罗明善意的提醒，不仅没有引起共产党领导人的警觉，反而使党中央将矛头指向了自己。

促成转移真相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长征出发的时间点是在何时何地决定。迄今为止，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具体指示、备忘录或者命令仍未被发掘。

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们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局并没有开会研究。

但学界有种说法认为，8.6万人的队伍选择在10月18日浩浩荡荡渡过于都河，是源于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党项与年的通风报信。

项与年，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长征前被安置在国民党军粤系将领莫雄手下。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由德国顾问赛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据传在这个会上完成部署，顾名思义，即在中央苏区四面构筑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发动总攻。

自称参会的莫雄下山后立即通知了项与年。项旋即扮成教书先生，身揣四本学生字典，化装成乞丐潜行通过封锁线，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将字典交给了老上级周恩来。在看似并无异样的字典上，有项与年用特种药水抄写的“铁桶计划”要点。

国民党军总攻在即，形势十分危急。北面，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向东或向南走是大海的方向，难以回旋。“三人团”于是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至10月下旬，而具体路线则是向西突围至湘西与贺龙会师。

10月初，共产党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打开缺口

的协定，于是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

省苏维埃政府教育部长石中球回忆。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同志和他等几个赣南省苏维埃政府的同志们一起开会，劳动部长在新陂区已经扩红一个月，却一个新兵都没有动员到。听到这个情况，毛泽东的一句话让石中球印象颇深：“扩、扩、扩，天天都是阿弥陀佛”。就好像他已经预感到，撤离，势在必行。而扩红，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至今，石中球仍然感佩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在那次会后，石中球接过劳动部长未完成

的扩红任务，结果下去发现，群众竟然都躲起来了。

其实，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早在第四次围剿之初就撰文写过这样的现象：“很多边区的群众上山之后又下山，度过一段平静日子后，又陷入恐慌。现在难以召集他们开会和采取军事行动。敌军一天天逼近，群众、当地党组织和政府干部都对主动出击失去信心。”

然而罗明善意的提醒，不仅没有引起共产党领导人的警觉，反而使党中央将矛头指向了自己。

促成转移真相

我们无法确切知道长征出发的时间点是在何时何地决定。迄今为止，关于长征准备工作的具体指示、备忘录或者命令仍未被发掘。

据周恩来在延安整风时回忆，准备出发时只由博古、李德和他们组成的“三人团”开过两次会，政治局并没有开会研究。

但学界有种说法认为，8.6万人的队伍选择在10月18日浩浩荡荡渡过于都河，是源于潜伏在白区的地下党项与年的通风报信。

项与年，中共中央特科人员，长征前被安置在国民党军粤系将领莫雄手下。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与中共地下组织有情报关系。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在庐山召开整军会议。由德国顾问赛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据传在这个会上完成部署，顾名思义，即在中央苏区四面构筑碉堡，形成铁桶一般的包围圈后，于11月发动总攻。

自称参会的莫雄下山后立即通知了项与年。项旋即扮成教书先生，身揣四本学生字典，化装成乞丐潜行通过封锁线，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将字典交给了老上级周恩来。在看似并无异样的字典上，有项与年用特种药水抄写的“铁桶计划”要点。

国民党军总攻在即，形势十分危急。北面，国民党中央军重兵所在，向东或向南走是大海的方向，难以回旋。“三人团”于是决定，将原定于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时间提前至10月下旬，而具体路线则是向西突围至湘西与贺龙会师。

10月初，共产党与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必要时假道”即在赣粤交界处打开缺口

的协定，于是临时中央决定将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一、三、

编者按：10月22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纪念日。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在金沙铁马的战争年代，英勇的红军战士凭借长征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顽强斗争，把敌人抛在身后，把困难踩在脚下，取得了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长征精神，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图强，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长征精神，在公司的建设和发展中，也发挥着强大的激励作用。在长征精神鼓舞下，公司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取得了一系列辉煌的成就。今后，公司将继续以此为动力，激发全体职工的工作激情，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踏上新的征程。本报特编辑关于红军长征的系列文章，回忆红军长征时期的困苦和艰辛，使全体职工感受当年的峥嵘岁月，品味今天的美好生活，珍惜今天的和平与幸福。

80年前八万将士的长征路

80年前，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历时两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结束。最初从江西于都河出发的八万多将士，仅有数千人到达终点，却积蓄了改写中国历史的力量。80年后，南方周末记者踏上当年的征途。

“长征地标”——不是简单的重走。我们追问纪念馆老照片中每一个普通士兵的名字，碑刻文字背后每一场惨烈

的往事：我们关注那片土地上今天迅速生长的城市，时代赋予长征新的价值意义。

“红军口述”——鲜活的一手历史。107岁的老红军刘福谈起他见证的生死，“人都是跟泥巴打交道，就算烧成灰喂鱼不都是一样么？”他走到了陕北，“解放后，我们九十多

个学徒只有我一个人了。”

“父辈的长征”——价值

观的传承。上个月，105岁的老红军寇庆延去世。儿子回忆说，长征中父亲差点被当做“改组派”枪毙，朱老总救了他。寇庆延后来从事政法工作，信条是：不要留下冤案错案。

80年前的那个夜晚，当八万六千多名红军在夜色迷蒙中分批撤离江西瑞金时，没有人能说清楚，他们这次在月光下的悄然行军是要去向何方、哪里才是尽头。

无论如何，世人已经无法忘记这次远征。

如今的长征以特有的魅力，使其突破了时代和国界。

和106岁的老红军刘福聊长征故事，他口若悬河一聊就是5个小时，我们分明看到了他眼中的神采。我们关注那些健在的红军老兵，他们是共和国的精神财富，他们亲历的长征，呈现更真实的历史；我们会通过老红军的后代，探寻其父辈的长征故事、战斗记忆、人生思考以及留下的精神遗产……正如周恩来所言，“我们红军像经过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留下树身和树根。”80年后的今天，回望那些激动人心的长征历史，人们仍会时不时地在重走长征这一仪式中寻找答案。

长征，具有历史和现实双重价值。对于历史的温习，不

仅仅是为了共同怀念一个逝去的时代，而是询问自己：能否找到集体共有的存在感，是否有理想与激情，还有信仰与使命？

习近平说：“长征永远在路上，我们这一代人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已经踏上征途，寻找历史留下的精神与信念，长征途中的红军印记。

我们试图透过红军历史纪念馆里凝结的故事，挖掘历史背后人的面貌和真实历史生态，向世人讲述一个更加清晰、更加精彩、更加真实的长征，探寻红军将士们被改变的命运，被改变的城市与家园，观察和记录变化中的中国，了解长征路上最重要地域的当年与今天。

二万五千里，挑战人类极限的悲壮远征。最初淌过于都河的八万红军将士，用双脚踏出道路突破重围，最终仅数千

人到达陕北。生死攸关，危在旦夕的撤退，却积蓄了足以改变整个中国命运的力量。

1934年10月16日，红一军团一师三团政治处总支书萧锋“突然接到命令”：午后四时出发。

次日，在行至卦江时，战士们饥不住了，不断问他：“总支书，队伍开到哪里去？”

萧锋无法回答，他只是听说，向南行动。

和萧锋一样，大部分红军将士也只能猜测。有人说

是湖南，有人说

是贵州，还有人说

是云南或四川。在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云石山上，干部们见面打招呼变成：“你走吗？”

有人说“当然”，另一些人却说“不知道”。

无人知晓自己的最终命运，除了当时有权做出命运安排的那个叫作“三人团”的成员：李德、博古、周恩来。

1934年3月中旬，国民党军队拿下距离瑞金150公里的广昌。红都危在旦夕，一批又一批的新兵仍在征集，尚未形成战斗力；而此

前忙着党

内斗争和扩红

的中央最

终决策者，还没有想好战略战

略。

“如果

不是

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

飞动双脚，踏破草鞋，

声东击西，纵横驰骋，

流过血流过汗的红军将

士，是绝对写不出这种英雄

史诗的。写《过雪山草地》：‘雪山低头迎远客 / 草毯泥毡

扎营盘 / 风雨侵衣骨更硬 / 千里路云和月。’

”作曲家们游览名胜，脑海里激荡着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的交

响，酝酿着以民族化、现代化、军旅特色为音乐创作基

调，充分调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广阔丰厚的音乐素

材，为《长征组诗》谱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美旋律。

从杭州回到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后，作曲家们按照萧华同志的讲解，对《长征组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学习和研究，反复加

工、修改。其间，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讨论和改稿会，他们百改不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令我感动。首先

是“写什么”，然后是“怎么写”的问题，写长征史诗，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紧紧抓住几个闪光点，写红军长

征，不搞假大空，要谱写成妇孺皆唱、雅俗共赏的群众歌曲。《长征组诗》，原稿12

首，作曲时选取了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每首一

曲，单独可以成歌，连起来是一组套曲。音乐作品的形式，按照常规应叫“大合唱”或“清唱剧”。这次既然将诗谱成了歌，原作《长征组诗》改为《长征组歌》。“组歌”这种音乐作品形式，得到社会

认可，此后凡是多段歌词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也都称作某某“组歌”了（如《军人道德组歌》《西柏坡组歌》等）。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之后，相继下基层、到部

队，为广大军民巡回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大家普遍认

为，这不仅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的英雄史诗，更是“革命的政治内

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红色音乐经典之作。作者萧华，既是长征战

士，又是红军的指挥员。他将长征的史与诗结合起来，熔铸成一部红色史诗，他将诗与音乐结合起来，使其便

于流行，久远传播；他将古今对接、中外融合起来，精

心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万里长征的壮丽画卷。具体

到诗歌创作，也是一节一代评诗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古典诗歌和民歌

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写《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 / 兵临贵阳逼昆明 / 敌人弃甲丢烟枪 / 我军乘胜赶路程 / 调虎离山

金沙 / 毛主席用兵真如

神。”

如果不是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飞动双脚，踏破草鞋，声东击西，纵横驰骋，流过血流过汗的红军将

士，是绝对写不出这种英雄史诗的。写《过雪山草地》：“雪山低头迎远客 / 草毯泥毡扎营盘 / 风雨侵衣骨更硬 / 千里路云和月。”

”作曲家们游览名胜，脑海里激荡着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的交

响，酝酿着以民族化、现代化、军旅特色为音乐创作基

调，充分调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广阔丰厚的音乐素

材，为《长征组诗》谱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美旋律。

从杭州回到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后，作曲家们按照萧华同志的讲解，对《长征组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学习和研究，反复加

工、修改。其间，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讨论和改稿会，他们百改不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令我感动。首先

是“写什么”，然后是“怎么写”的问题，写长征史诗，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紧紧抓住几个闪光点，写红军长

征，不搞假大空，要谱写成妇孺皆唱、雅俗共赏的群众歌曲。《长征组诗》，原稿12

首，作曲时选取了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每首一

曲，单独可以成歌，连起来是一组套曲。音乐作品的形式，按照常规应叫“大合唱”或“清唱剧”。这次既然将诗谱成了歌，原作《长征组诗》改为《长征组歌》。“组歌”这种音乐作品形式，得到社会

认可，此后凡是多段歌词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也都称作某某“组歌”了（如《军人道德组歌》《西柏坡组歌》等）。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之后，相继下基层、到部

队，为广大军民巡回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大家普遍认

为，这不仅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的英雄史诗，更是“革命的政治内

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红色音乐经典之作。作者萧华，既是长征战

士，又是红军的指挥员。他将长征的史与诗结合起来，熔铸成一部红色史诗，他将诗与音乐结合起来，使其便

于流行，久远传播；他将古今对接、中外融合起来，精

心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万里长征的壮丽画卷。具体

到诗歌创作，也是一节一代评诗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古典诗歌和民歌

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写《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 / 兵临贵阳逼昆明 / 敌人弃甲丢烟枪 / 我军乘胜赶路程 / 调虎离山

金沙 / 毛主席用兵真如

神。”

如果不是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飞动双脚，踏破草鞋，声东击西，纵横驰骋，流过血流过汗的红军将

士，是绝对写不出这种英雄史诗的。写《过雪山草地》：“雪山低头迎远客 / 草毯泥毡扎营盘 / 风雨侵衣骨更硬 / 千里路云和月。”

”作曲家们游览名胜，脑海里激荡着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的交

响，酝酿着以民族化、现代化、军旅特色为音乐创作基

调，充分调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广阔丰厚的音乐素

材，为《长征组诗》谱写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美旋律。

从杭州回到原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后，作曲家们按照萧华同志的讲解，对《长征组诗》进行了深入细致地学习和研究，反复加

工、修改。其间，我曾参加过他们的几次讨论和改稿会，他们百改不厌、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令我感动。首先

是“写什么”，然后是“怎么写”的问题，写长征史诗，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要紧紧抓住几个闪光点，写红军长

征，不搞假大空，要谱写成妇孺皆唱、雅俗共赏的群众歌曲。《长征组诗》，原稿12

首，作曲时选取了从《告别》到《大会师》10首。每首一

曲，单独可以成歌，连起来是一组套曲。音乐作品的形式，按照常规应叫“大合唱”或“清唱剧”。这次既然将诗谱成了歌，原作《长征组诗》改为《长征组歌》。“组歌”这种音乐作品形式，得到社会

认可，此后凡是多段歌词组成的大型声乐作品，也都称作某某“组歌”了（如《军人道德组歌》《西柏坡组歌》等）。

1965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正式演出。之后，相继下基层、到部

队，为广大军民巡回演出，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好评。大家普遍认

为，这不仅是一部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胜利的英雄史诗，更是“革命的政治内

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的红色音乐经典之作。作者萧华，既是长征战

士，又是红军的指挥员。他将长征的史与诗结合起来，熔铸成一部红色史诗，他将诗与音乐结合起来，使其便

于流行，久远传播；他将古今对接、中外融合起来，精

心描绘出一幅有声有色的万里长征的壮丽画卷。具体

到诗歌创作，也是一节一代评诗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古典诗歌和民歌

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写《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 / 兵临贵阳逼昆明 / 敌人弃甲丢烟枪 / 我军乘胜赶路程 / 调虎离山

金沙 / 毛主席用兵真如

神。”

如果不是在毛主席直接指挥下，飞动双脚，踏破草鞋，声东击西，纵横驰骋，流过血流过汗的红军将

士，是绝对写不出这种英雄史诗的。写《过雪山草地》：“雪山低头迎远客 / 草毯泥毡扎营盘 / 风雨侵衣骨更硬 / 千里路云和月。”

”作曲家们游览名胜，脑海里激荡着历史与未来、战争与和平的交

响，酝酿着以民族化、现代化、军旅特色为音乐创作基

编者的话

1934 年 10 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被迫退出原有的中央根据地并进行转移,由此开启震惊世界的长征。时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相继会师,这一翻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征程宣告胜利终结。长征的艰险程度举世罕见,然而,完成这一人类壮举的却是一支平均年龄低得令人惊叹的军队,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这支队伍中还有近 3000 名红军女战士克服了比男性更大的困难。

80 年来,长征成为我们党史、军史、国史研究中最富饶的课题之一,这一罕见征程持续不断地为当下中国提供充沛的精神资源。回望二万五千里路上的那些勇气、青春与信仰,“长征精神”的核心特征有哪些?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新长征”途中,当代青年又如何继承这一精神财富?在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本报转载中央文献研究室 3 位专家的解读,以飨读者。

用青春谱写的恢弘史诗

■在长征中,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 20 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 30 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他们在跋涉中成长,在战斗中走向成熟。多年后,曾经的青少年们不少成长为彪炳史册的新中国开国将领。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革命理想高于天

红军长征前行的每个脚印,都诠释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长征途中有一位多次身负重伤坚持不下火线的钢铁汉子,他就是红二军团的第 6 师师长贺炳炎。

1935 年 12 月,红二、六军团在湘西西南的瓦屋塘与敌军陶广纵队激战,22 岁的贺炳炎率部配合主力战斗,右臂骨头被打碎,负了重伤。军团卫生部长贺彪用修械所的钢锯给他做截肢手术。他咬着手巾忍住剧痛,截去了右臂。贺龙同志特意要了两块锯下的碎骨头,包进红绸布以教育干部、激励部队:“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啊!贺炳炎的是右臂虽然失去了,但他何尝为全体劳苦大众谋解放的坚定信念继续行军出征,打了不少胜仗。”

1935 年 8 月 21 日,被红二十五军许多官兵称为该军历史上最黯淡的一天。当天,军政委吴焕先在部队远征接近陕北根据地之前,于甘肃泾川四坡村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 28 岁。作为一个富户出身的读书人,吴焕先家里有近百亩地和一个小店铺。然而,1925 年入党后,他在自家门前当着农会和群众的面,将土地房屋契约和债据全部烧毁,农民因此更加信任他,跟着他闹革命。敌人为了报复他,先是残酷杀害了他的大哥、二哥,逼死其大嫂和不到

半岁的侄子,随后又杀害其父亲、五弟;其母亲、有孕在身的妻子也被迫逃到他乡,冻饿而死。这位文质彬彬像个教书先生的红军政委,一听枪响总是抡起大刀带头冲锋,最后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尽管敌人逞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

部队的高级将领在第一线指挥作战,甚至身先士卒地冲锋,即使在冷兵器时代也不多见。然而,在长征中,这样的情景司空见惯。长征中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自始至终都不只是普通战士,将士们的鲜血是洒在一起的。在红军指战员眼中,把指挥位置设在远离枪炮威胁的后方,是一种难以接受的耻辱。在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长征烈士名录上,仅营以上干部就达 422 人,而他们的平均年龄还不到 30 岁。

年轻英勇的红军将士之所以能够视死如归、浴血奋战,之所以能够战胜人间难以想象的千难万阻,就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着为人民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奋斗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这也正是我们每每唱起《长征组歌》,唱起“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时心炽血沸的原因所在。

严守纪律、团结一致

从 1934 年 8 月红六军团奉中央令西征开始,到 1936 年 10 月三大主力在会宁和将台堡会师,红军组织过 600 多次大小战斗,投入

师以上部队参加的达 120 次。在敌军重兵围追堵截之下,缺少装备且疲惫不堪的红军一路断系,何以能如洪流一般不可阻挡? 1935 年 10 月,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时说:“每次战斗前,连队的党员都召开会议,选出后备指挥员,大约有四五十个人。如果连长在前线受伤或者牺牲了,队伍不会跑散,因为第一后备连长会立即挺身而出;如遇不幸,第二后备连长又会代替他,一个接着一个。党员受伤后,为了不影响同志们的情绪,总是对他们说:‘没关系,你们继续前进吧。’”

红军指战员服从指挥,顾全大局的组织纪律性,由此可见一斑。

中共中央委员黄在长征开始后一再变动的职务,也正是对红军的高度组织纪律性和罕见凝聚力的生动注脚。1908 年出生的黄是标准的无产阶级,1925 年入党,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作为工人出身

的代表人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1930 年年底,黄奉命到湖南苏

区工作,先后担任过红十二军政委、第三十四师政委、第一军团一师政委等职务,长征开始后担任红八军团政委。湘江战役后由于部队只剩下 1000 人,红八军团撤编并入红五军团,黄复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委。一渡赤水后,毛泽东亲临红一师进行整编动员,还特意对黄说:你可是当过军团政委,当团政委确实有点大材小用。但黄当即表示,就是当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自己也心甘情愿。1935 年年底,刚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面临东北军进攻,由于红一方面军红四团的两位主官在直罗镇的战斗准备中病重,中央决定由黄担任红四团代政委。在率部突破前沿阵地进行追击时,敌军一颗子弹夺去了黄年仅 27 岁的生命。黄这样的职务变动并非偶然,部队伤亡大造成编制和领导人变化速度非常快,但这也反映了共产党员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也是红军能以弱胜强的重要原因之一。

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互相帮助、团结友爱,充分体现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干部处处关心战士,战士时刻想着干部。一粒米、一滴水,大家你推我让,谁也舍不得吃,舍不得喝。官兵之间情同手足,战友之间情深似海。在生死的关键时刻,大家往往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正是由于红军长征途中如此团结一致的集体主义精神,才战胜了道不尽的艰难险阻,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挑战生存的极限

长征中的作战是在敌强我弱形势下进行的殊死搏斗。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集结了数十万兵力,利用山川险阻,以逸待劳,乘坐现代化交通工具前堵后追。长征路上,不仅有敌人的围追堵截,还有险恶的自然环境的挑战。也正是在这种难以用文字详尽描述的苦难中,生命的耐力与能量一次次得以延续和升华。

在所有参加长征的战士中,有这样一特殊群体:不到 3000 名的女红军,她们大多在 24 岁以下。她们与男同志一样行军打仗、筹粮筹款、抬担架、做群众工作、护理伤病员,还承受着比男人更为严峻的生理考验。女红军们遭遇的困难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

长征途中,女红军战士把“鞋”和“脚”都称为“量天尺”。脚在长征中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脚受伤,就有掉队的危险,而落入敌人之

手的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保护脚,鞋的作用愈发突出,鞋成了每位红军战士的宝贝,对女战士来说更是如此。红六军团女战士李贞在长征途中只剩下半新不旧的一双布鞋,平地行军时她就干脆脱下鞋光脚走路,遇上难走或夜行军赶路时才穿上。但时间长了,鞋还是磨破

了,等到实在不能再穿时,她就先丢掉一只鞋,遇上难走的路就只穿一只鞋。后来,这只鞋也丢了,她只好光脚走路,遇到难走的路就用绑腿把脚缠起来走。而在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则是一位裹着小脚的女性,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险山恶水。

1935 年 3 月 10 日深夜,更准确地说是 11 日凌晨,在贵州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前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脚小道上,毛泽东手拎一盏马灯,步履匆匆地走了 3 里多路。云贵高原的雨后春夜,寒意刺骨,四周一片黢黑,只有马灯昏黄的光线映照着一个孤独的身影:在白天召开的 20 多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只有自己的 1 票。

在这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增选为中央政

■毛泽东深知他所坚持的,是党和红军的根本前途所在,所以他不顾个人进退得失。这是他自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被免除红军内的领导职务后第一次有了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力。当时,红军经过二渡赤水,再占遵义,重创国民党中央军两个师、黔军 8 个团,士气正旺,都希望能打大胜仗,甚至在云贵川地区建立新根据地。

3 月 10 日,红一军团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联名致电中央,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驻扎在那里的黔军。接到电报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马上在驻地苟坝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行讨论。遵义会议以来,红军的每一次战斗行动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决定的。

会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不同意进攻打鼓新场,其他人则都同意。毛泽东试图努力劝阻大家,因为,尽管打鼓新场只有战斗力不强的黔军,但这里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而周围有中央军周浑元、吴奇伟的 8 个师,有滇军孙渡的 4 个旅,还有随时可以扑来的川军。一旦不能迅速攻克,势必马上陷入

重围。可惜,这些分析没有被大家接受。张闻天看天色已晚,提议表决,毛泽东当即表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他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没法干了。他试图以去留挽回形势,谁知一位与会同志不满道: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干什么?另一位同志也

说,不干就不干。表决结果是毛泽东只得到了自己那 1 票,这样,不仅第二天一早就要下达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还免除了毛泽东刚上任一周的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

事已至此,毛泽东可以说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大可以回去好好休息一下,等待前方战报。可如果这样,就不是毛泽东、红军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也可能会被改写。事实是,散会后,毛泽东继续反复权衡这次作战计划的利弊得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思虑的是红

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长征以来,红军尽管英勇奋战,却屡受挫折,从出发时的 8 万多人减少到了 3 万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有了话语权,其合理化建议被采纳,红军才稍稍恢复了一些元气,但以这点本钱与优势敌人血拼,无异于自寻绝路。

席半夜提着马灯又到我那

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把大家说服了。”

当年,毛泽东说服周恩来后,马上又请来朱德一起商议,朱德也表示赞同。时间到了凌

晨 4 点左右,中革军委二局截获了敌人电报,确认滇军和川军正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其周边已有敌人 100 个团。这一情报验证了毛泽东的预判。在随后一早举行的会议上,因为周恩来、朱德的支持,加上新情报的佐证,与会同志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还恢复了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

苟坝春夜的那盏灯火,形象地映照了长征精神的诸多要素。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部队相继会师,这一翻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征程宣告胜利终结。长征的艰险程度举世罕见,然而,完成这一人类壮举的却是一支平均年龄低得令人惊叹的军队,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这支队伍中还有近 3000 名红军女战士克服了比男性更大的困难。

80 年来,长征成为我们党史、军史、国史研究中最富饶的课题之一,这一罕见征程持续不断地为当下中国提供充沛的精神资源。回望二万五千里路上的那些勇气、青春与信仰,“长征精神”的核心特征有哪些?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的“新长征”途中,当代青年又如何继承这一精神财富?在纪念长征胜利 80 周年之际,本报转载中央文献研究室 3 位专家的解读,以飨读者。

■在长征中,平均十七八岁的战士,由 20 岁出头的师、团首长带领,在一批 30 岁上下的红军将领指挥下,克服千难万险,转战十几个省,长驱数万里。他们在跋涉中成长,在战斗中走向成熟。多年后,曾经的青少年们不少成长为彪炳史册的新中国开国将领。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史上罕见。然而,创造人间奇迹的这支队伍,却是一支很年轻的队伍,其中大约 54%的红军官兵都在 24 岁以下,只有 4%的人超过 40 岁。正是这样一支散发着蓬勃朝气的队伍,面对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面对挑战人类生存极限的雪山草地,不曾有过任何的退缩和动摇,用青春的血肉之躯谱写出惊天动地的恢弘史诗。

从 1934 年 10 月至 1936 年 10 月,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第二十五军先后离开原来的根据地,进行了震惊世界的长征。其历时之长、行程之远、敌我力量之悬殊、自然环境之恶劣,在人类战争

长征——需要回答的六个疑问



有人形容，长征是个谜。正是谜，而让人疑问。

1937 年 10 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出版，连续 5 次印刷。次年在美国上市，迅速登上销售榜榜首。美国总统罗斯福读过，数次会见斯诺，认为红军长征是一次“震惊世界的行军”。他们预言：“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

史沫特莱实地采访后感叹：“长征是革命战争史上伟大的史诗”，甚至“绝不仅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的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

半个多世纪以来，探寻长征意义，试图写出“全部史诗”者，来了一拨又一拨。

1981 年 7 月，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写出《沿着长征路线朝圣记》，他说：“红军战士都有非凡的理想和抱负。他们全心全意为事业而战，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1984 年，年逾 70 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撰写出《长征——闻所未闻的故事》，他赞叹：“本世纪中没有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

的确，不管从哪个角度解读，长征都是伟大的。但也有些问题困扰着人们，必须作出回答。

疑问一：既然“跟着走”，政治信仰坚定体现在哪里

长征胜利数十年后的一天，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向其提问：“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跟着走！”作为最早的革命家之一，也是长征的亲历者，他没有谈到政治信仰。

2004 年，新华社军分社与《北京青年报》联合开展大型系列采访活动“我的长征——寻访

健在老红军”。采访涉及 76 位老红军。座谈会上有人提出疑问，一直讲红军是有信仰的队伍，为什么 76 位老红军没有一人讲自己因信仰参加红军和长征，而是强调自己为吃饭而来？

这是个必须辨析的重大问题。红军官兵若非因信仰而来，便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军没有区别，也应了国民党的污称，“共匪”、“赤匪”，长征是“流寇”行为。推而广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没有跳出“江山轮流坐”的历史逻辑。倘真如此，伟大长征或长征精神也便成了“虚构”，甚至纯粹是为执政寻找法律和道义支撑。

红军长征的精神支撑是否来自于信仰信念？回答是肯定的。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 3 个以“万里”为计的活动：万里长城、万里丝绸之路、万里长征。3 个万里中有“一个半”与信仰有关。“半个”是万里丝绸之路，当年敢于过沙漠、闯戈壁，越雪山者，除了为利益而来的商队，就是传播佛法的僧侣，所谓“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一个”是万里长征，在今天的云南迪庆和四川甘孜之间，有个叫香格里拉的地方，直线距离并不遥远，却横亘着连绵雪山，历史上靠双脚走过这段距离的只有两支隊伍，一支是喇嘛教的僧侣，另一支是中国工农红军。两者都在追求自己的精神天堂。两支隊伍相比较，红军队伍甚至比喇嘛队伍更富精神感召力，这也是天竺喇嘛脱去袈裟换上红军军装的原因。

认定红军的精神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佐证很多。瑞士籍英国传教士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中说：“许多报道因红军抓了我们这些人的举动，而将他们称为匪徒和强盗，实际上红军领导人是坚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徒，并在实践着其原理。”他又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爱前行。有信仰的队伍不轻易动摇，张国焘叛变革命后，受国民党指派搞策反，原本张国焘信心满满，结果未拉走一兵一卒，气得戴笠大骂其无能。为什么张国焘无力策反自己组织的部队？这就是理论武装与坚定信仰的作用。当大字不识的农民、俘虏过来的士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武装，便实现觉醒，进而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二：既然同利益而帝，何言红军高尚于旧军队

有人形容，红军长征是一次武装巡回宣传活动。的确如此，一路走来，只要是红军走过的地方，都会留下印迹——宣传标语。如果归纳分析标语内容，又会发现其中很多是围绕“吃饭”展开：“没饭吃的穷人快来赶上红军”，“不当挨打挨饿的白军，大家当红军去”……当然，最重要的“吃饭”还是“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说明，红军最吸引劳苦大众的还是解决吃饭问题。“吃粮当兵”几乎是旧国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宣传模板。显然，红军也没有超越这个模板，进一步说，红军也是为利益而战。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强调红军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军队更先进？因为找饭中存在差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利益更带有根本性，离开利益就要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任何政治集团都不可能回避利

益，问题的关键在于为哪个阶级的利益而来，或利益与哪个阶级分享。

西方学者罗杰·霍华德的研究也关注了利益问题。红军“制定了在农村彻底消灭恶霸势力的纲领，烧毁田契和地契，分配谷物，解放被压迫妇女，召开群众大会，比较自觉地开展宣传反对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运动，使成为坚定的革命者，从此他们不再依附于单人，而是信仰主义，追求真理。

有了信仰，就会创造精神的高地。在四川红原县与黑水县的交界处，有一座亚夏山，海拔 4800 米，在北极垭口，建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这里埋葬的是 1936 年红军长征牺牲于此的 12 名红军战士，他们的遗体在牺牲 16 年后被发现。可以说，这个红军烈士陵园不仅有地理上的高度，更有精神上的高度。试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平均每天一次战斗，每 300 米有一名红军官兵倒在前进的路上，如果没有任何坚定的政治信仰作支撑，断不可能完成这次“死亡行军”。如张闻天所言：“没有理想，不用说万里长征，红军连一千里都走不了。”

回到前面的疑问。邓小平之所以讲自己“跟着走”，除了形象说法，主要因为长征初期的邓小平是顶着“右倾错误”的帽子，且没有担任高级指挥员。既然不是决策者或参与决策者，自然是跟着走。但从信仰信念的角度讲，他的坚守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行军战斗过程中，他克服困难，主持编印了两期《红星》报，向红军官兵宣传真理，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期间，每到一处都组织刷标语，向人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红军的主张。如果没有信仰，便不会如此自觉。

疑问五：既然十人剩一，怎敢言长征取得了胜利

中央红军出发时 8 万多人，到达陕北仅剩 7000 人，不到十分之一。从人数骤减来衡量，长征应当是失败的行军。然而，我们一再强调长征是一次伟大胜利，理由何在？先看一下各方面的分析。

1935 年 12 月，毛泽东就此问题专门作答：“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一个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我们红军的人数比以前是少了一些，但是留下来的是中国革命的精华，都是经过严峻锻炼与考验的。留下来的同志不仅要以一当十，而且要以一当百、当千。”因此，“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对于数量多寡与胜败的辩证关系，稍加分析便可弄清。五次反围剿的敌我力量对比分别是：第一次 2.5：1，第二次 6：1，第三次 10：1，第四次 12：1，第五次 5：1，前 4 次红军胜了，后一次败了。这说明，胜利不仅仅取决于人枪数量，还有指挥员指挥得当，官兵英勇顽强，不怕牺牲。

当然，最根本的胜利，在于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动天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动天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动天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动天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动天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相信的，但是要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就灵了，就打胜仗了。”“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李德显然也是属于教条主义的样板，这一点他本人有认识且承认自己“除批评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外，可以说争夺军事领导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就是因为兵强马壮而挟迫中央，这和封建军队和军阀军队的拥兵自重有什么区别？既然没有区别，我们似不能再言“团结一心顾全大局”。所以作肯定回答，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从执行层看，红军官兵团结一致可谓感动天地，事例不胜枚举。如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所唱的歌曲《团结地久天长》：“一、二、四方面军的战友，终于汇聚一堂。往日的千山万水，阶级情深意长。”传教士薄复礼说：“感谢

对

整个中国革命的实践与理论积淀，同时把毛泽东推到最高领导岗位。如果没有长征过程中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反思，就没有遵义会议的转折，没有毛泽东重回领导中心。或者说，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深刻认识，党和红军会继续受王明教条主义的影响，要接受不了解中国国情的李德的瞎指挥，红军注定失败。

我们不妨作些假设，王明如果不仅仅在思想路线上影响我党，而是具体指挥红军，那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左倾”冒险和教条主义会导致什么结果？一定不仅仅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马思思为什么提出革命会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是因为那里有工人阶级，苏共走了“城市开花”革命道路，原因在于此。中国是农业经济社会，仅有一些手工业者，他们并没有经过大工业生产的锤炼，力量是很有限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 448 万人，只有 2.5% 出身于工人阶级。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主导的社会，照搬苏联经验，中国革命不可能成功。

所以，毛泽东所说：“马克思和列宁都曾说过，他们的理论仅仅是行动的指南，是指导方向的，不能当作教条。但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得这一点，后来受了损失，吃了苦头，才明白。”“这以后我们就得到了教训，知道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是应该

专题

走好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

——写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下）

整个民族的先锋队。

2016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英雄史诗 不朽丰碑”主题展览时强调，现在，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

“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

遵义，一个响亮的名字。对历史而言，它意味着转折。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结束了李德、博古以“完全马克思主义”面目出现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革命形势出现转机。

更为可贵的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的典范，会议的结果使红军由挫折走向胜利，更开启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从此，这条道路，危机

的暴风雨就会到来。历史学家认为，具有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遵义会议是第一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第二个。两次会议的共同点，是实事求是、大胆创新、一切从实际出发，用新的办法解决问题，在巨大的危机中迎来转机。

1978年12月13日，北京冬日的阳光里，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由此，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长征。

春天的故事开始了。“长征接力有来人”，这是叶剑英对青年人的期许。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与“新长征”概念同时出现，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是对长征精神的继承和弘扬。1981年，中国男排战胜韩国队挺进世界杯，北大学子兴奋地喊出口号：“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同年，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并获得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新长征突击队标兵”称号。改革开放让中国大春潮叠起，经济腾飞，包产到户、合资办企、特区开发，更多的

苦卓绝的长征中，历经磨难与洗礼，我们党形成了自己最大的优势：以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为基础，确保实现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一靠理想，二靠纪律，步调一致，是长征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是我们党90多年来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法宝。

1935年10月，长征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不顾中央部署，领军南下，另立“中央”，这一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行为，受到广大党员的坚决抵制。朱德同志严正表示，全党只有毛泽东领导的

一个党，必须维护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一领导。事后，毛泽东称张国焘的行为是“一个大教训”。鉴于这个教训，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说，这是最重要的纪律，全党要“一起遵守纪律”“统一行动”。

1985年3月7日，改革开放风起云涌。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即席讲话，要求共产党员干部“有理想，有纪律，这两件事我们务必时刻牢记在心。”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统筹国内国际大局，推动改革发展稳定，从严治党，进一步提振干部队伍，提升全党素质，提质改革发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施工高峰期，是落实改革任务的攻坚期，任务艰巨繁重。面向“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面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党同志更要进一步强化看齐意识，自觉做到“四个服从”，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坚守党员干部的政治原则和行为规范。

新中国发向太空的每一枚火箭，箭体上都有两个鲜红的大字：长征。1968年12月5日凌晨，力学专家郭永怀乘飞机从青海实验基地飞临北京机场，着陆时，空难发生了。当人们从机身残骸中寻找到郭永怀时，发现他的遗体同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烧焦的两具遗体被分开后，中间掉出一个完好无损的公文包，里面是绝密的科研文件。在最后瞬间，郭永怀只想到用身体保护宝贵的资料！郭永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被授予“烈士”称号的科学家，他和他的团队所铸就的精神，被称为“两弹一星”精神。

这是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在建设年代的延续，与改革时期的抗洪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起，共同形成我们党的精神坐标，如同一座座直指云天的山峰，绵延不绝，走向未来。

共产党员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党员履行的八条义务列在前面，党员享有的八项权利置于义务之后。任何时候，共产党员都必须义务当先、责任担当，牺牲在前，在理论武装、纪律监督和精神感召下，成为工人阶级和

1935年年底，中央红军离开黔东南苗族侗族聚居地，继续西行。依依惜别时，红军送给侗族同胞马匹和枪支作为礼物，他们都不要，只留下了红军的一部留声机。

长征经历了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即便民俗不同、宗教各异，但文化工作却总能使情感流动、让精神相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文化的军队会打败仗，没有文化视野的长征史不是完整的长征史。

长征前，文化工作是指明方向，鼓舞士气的精神食粮。在行前动员中，红军宣传队员广泛运用传单、发布告、做宣讲、办壁报、编歌谣、出海报、演舞台剧等形式鼓舞发动群众。

陈树湘，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在湘江一战中，他带领队伍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4天4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腹部中弹的他，在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被俘，在被敌人抬着请赏的路上，亲手掏腹断肠，英勇就义。

陈金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宣传干事。作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的一员，他经历了饥饿、寒冷、急行军、滂沱的暴雨和水至没膝的沼泽，最终因为虚弱和高烧而牺牲。临终前身上唯一干燥的物件，是他为全团贴身保存的几根火柴。

二万五千里，时时关生死；七百多个昼夜，处处见英雄。信仰的力量，让一支“落魄”的军队变得“富有”，让一条险境环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有信仰，才有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意志与信念。转战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其无私无畏，一扫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百年来腐朽、守旧、毫无精气神的衰败气象，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亿万劳苦大众懂得了：压迫的锁链终将被斩断，而命运的利刃就在自己手中。

有信仰，才有舍生忘死、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十多万红军指战员血洒征途，前赴后继，最终成为了一股势不可当的铁流。

有信仰，才有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强渡嘉陵江、激战独树镇……无数次的千钧一发、一路上的百战艰难，都靠着必胜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一路闯将过来。

大河奔流，逝者如斯。今天，陈树湘牺牲的地方，郭金雄长眠的土地，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远征。决胜全面小康，没有枪林弹雨，但仍需披荆斩棘；实现民族复兴，不见战火纷纷，但仍需破路开山；完成这场新长征，仍需有血液中的火、精神上的钙，仍需“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于是，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各项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力求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不断重申着长征用血与火写下的启示：“不忘初心”，方能“继续前进”。

没有文化的军队会打败仗，没有文化视野的长征史不是完整的长征史

信仰的力量，让一支“落魄”的军队变得“富有”，让一条险境环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缺乏少穿、缺医少药、没有足够的枪弹和重武器，连最基本的供给都没有，人数也急剧锐减……在外人看来，长征中的红军，大概是世界上最落魄的部队。然而，深入红军访问的埃德加·斯诺却从毛泽东住的简陋窑洞、周恩来睡的粗糙土炕、彭德怀用缴获的降落伞制成的背心，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力量——信仰。

陈树湘，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在湘江一战中，他带领队伍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4天4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腹部中弹的他，在被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被俘，在被敌人抬着请赏的路上，亲手掏腹断肠，英勇就义。

陈金雄，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宣传干事。作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的一员，他经历了饥饿、寒冷、急行军、滂沱的暴雨和水至没膝的沼泽，最终因为虚弱和高烧而牺牲。临终前身上唯一干燥的物件，是他为全团贴身保存的几根火柴。

二万五千里，时时关生死；七百多个昼夜，处处见英雄。信仰的力量，让一支“落魄”的军队变得“富有”，让一条险境环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有信仰，才有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意志与信念。转战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其无私无畏，一扫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百年来腐朽、守旧、毫无精气神的衰败气象，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亿万劳苦大众懂得了：压迫的锁链终将被斩断，而命运的利刃就在自己手中。

有信仰，才有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强渡嘉陵江、激战独树镇……无数次的千钧一发、一路上的百战艰难，都靠着必胜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一路闯将过来。

大河奔流，逝者如斯。今天，陈树湘牺牲的地方，郭金雄长眠的土地，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远征。决胜全面小康，没有枪林弹雨，但仍需披荆斩棘；实现民族复兴，不见战火纷纷，但仍需破路开山；完成这场新长征，仍需有血液中的火、精神上的钙，仍需“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于是，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建设各项任务，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力求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不断重申着长征用血与火写下的启示：“不忘初心”，方能“继续前进”。

没有文化的军队会打败仗，没有文化视野的长征史不是完整的长征史

这个主义而不是别的理论

二万五千里远征，用每个标准丈量都是奇迹。日均行军七十余华里，近乎每天一次遭遇战，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被变动的军事战略转移为主动的政治战略转变，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这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在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

的极端境遇中，迈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一步，完成了一次涉及到大半个中国的真理传播，则是文化史和传播史上的奇迹。

这是一次大规模、高频次、跨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尝试。

从赣南到陕北、从岷山到秦岭、从湘江到赤水，长征经过了岭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十四个省份，经过了苗、瑶、侗、布依、土、水、番、傣、彝、纳西、白、藏、回、羌等数十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综合运用当地方言、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结合当地不同的社会革命诉求，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送到了“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斯诺语）。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理论硕果的关键环节。

贵州北部小城遵义的一场会议，让长征和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也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走向成熟。从近处梳理，红军随后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历史远观，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最终开辟了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自己的道路”。

关山历尽，马蹄依稀。八十年后，站在民族复兴之路与世界发展大势的交汇点上，我们仍在思索：这场征途中的理论播种到底留下了什么？它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规律，它展现出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后的巨大力量，它提供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发展的实践”的重大启示。它所体现的规律和过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阐扬，在党的十八以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会议中再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更重要的是，用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最有张力的历史语言告诉后人，为什么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了这个主义而不是别的理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不是别的模式。为什么要始终怀着“行前人所未行”的战略魄力与“行前人所未行”的历史责任感，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开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锁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

这话语，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长征的时代回响。

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已将精神的种子埋入了时间。

“长征”，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富强、复兴的征途具象化“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八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如是说。实际上，对于“全部史诗”的细节，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寻找。

1934年5月3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刊发了这样一则报道：《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内容是江西省瑞金县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的八个儿子同时报名参军的事迹。四个月后，长征开始。人们关于这八位年轻人的最后消息，是他们在长征中全部牺牲的噩耗。时间地点，不详；后代去向，不详。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后，红四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焰，攀着桥上铁索前进，一举夺取泸定桥。几十年之后，这电光石火的历史瞬间已被写入了教科书。但22位勇士中却只有8位的名字能够确定，其他人的纪念碑仍然是无字碑。

漫长的时间里，学者、记者们踏破铁鞋，不断追寻着这些在历史指缝中遗漏下的信息。结果可能并不乐观，但“寻找”本身就已构成意义。它是追念、是激励、是寻根，是对我们“共同守誓的理想信念”、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持久呼唤。

寻找，是看清民族的未来。长征这一伟大远征的背后，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贞不拔的民族品格，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志，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抱负，是“苟取丹心照汗青”的胸怀，是“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血性，也是“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理想。

寻找，是探寻民族的未来。

八十年来，“长征”二字已不仅仅指1934至1936年间的一段历史，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富强、复兴征途的具象化；长征精神已不仅仅指向这二万五千里的行程，而且不断拓展着中华民族与时代精神内涵，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代都结出了硕果，最终形成了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巨大力量。凡是活着的历史，都贯穿着精神的线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广义的长征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任务，需要我们将文化自信作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力量，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真正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

它用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最有张力的历史语言告诉后人，为什么中华民族最终选

时刻准备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

历史从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清醒地指出：“改革往往都是从易到难。我们的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敢于涉深水区、啃硬骨头。我们要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气魄、坚忍不拔的毅力推进改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敢于触及深层次利益关系和矛盾，坚决冲破思想观念束缚，坚决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坚决清除妨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在美国出版的一本名为《人类1000年》的书中，这样解释长征对人类进程的影响，“它告诉人们，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可贵的是永不言败，就是顽强不屈，就是高举信仰的旗帜、理想的火炬，不达目标绝不罢休。”

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路线图，更加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更加有针对性解决各领域各环节各环节的矛盾和问题，强化基础支撑，注重体系集成，完善工作机制，严格督察落实，不断提高改革精准化、精细化水平，坚定不移把全面深化改革推向前进。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我们的长征路，仍要这样走下去。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既要坚定不移，又要因时、因势而动。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

我们的长征，从新的起点开始：

“95年来，中国走过的历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走过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用鲜血、汗水、泪水写就的，充满着苦难和辉煌、曲折和胜利、付出和收获，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不能忘却、不容否定的壮丽篇章，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继往开来、奋勇前进的现实基础。”

我们的长征，确定了新的目标：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勾画出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年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党全国要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锐意

创新、开拓进取，共同为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而奋斗。”

改革关头勇者胜，气可鼓而不可泄。“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我们党作为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440多个党组织的党，作为一个在有着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在面向“两个一百年”前进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永葆活力。

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做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深秋，贵州省平塘县克度镇的山坳里，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世界最大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建成启用。葱翠的山间，这口直径500米的银白色金属“大锅”格外令人震撼，人们叫它“天眼”。

“天眼”将用来探测宇宙中的遥远信号和物质。一降生，它就以其巨大的口径取代了大名鼎鼎的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成为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有人预测，未来20年至30年中，天眼的技术稳居世界一流。由此，它在国内外引起轰动，参观者蜂拥而来。

与“天眼”同时亮相的，是国家级贫困县平塘。县城里原来没有路灯，只有3家旅店，一个单间一晚只要15元。

但“天眼”改变了一切。路修好了，电通了，一家五星级酒店已经开张，更多的饭店还在建设

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勾画出的宏伟蓝图，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阶段，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就是到2020年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进而到21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年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坚实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全党全国要同心同德、埋头苦干，锐意

（本版来源：《光明日报》）

将精神的种子埋入时间

——写在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上）